

庚款 留学百丰

■ 程新国/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出版集团重点图书出版资助项目

庚款留学百丰

■ 程新国/著

庚款留学百丰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庚款留学百年/程新国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4

ISBN 7-80186-347-X

I. 庚... II. 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3385 号

庚款留学百年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

印 张: 20.75 插页 2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0186-347-X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庚款,是1900年“庚子事变”后各国列强强加给我国的巨额赔款,为百年国耻中的莫大创痛。

后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带头“退还”本已多收的部分庚款,用于培养留美中国学生,后来其他一些国家加以效仿,由此形成了一项历时近半个世纪的特殊留学活动——庚款留学。

这项留学活动,因源于庚款,故一开始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国耻的烙印,这也是后来人们耻于谈论这一留学活动的原因之一。所以,当这段历史终结后,也就随之寂寥无闻。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拂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是因为其中的许多事件足以激动人心、催人奋进;有些事件甚至对中国走向今天的文明昌盛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孔子曰:知耻而后勇。

当年,那些庚款留学生,正是顶戴着庚款的耻辱,负笈美欧,孜孜以求,将大耻化为大勇,卓有成效地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文化引回中国,这些勇敢的盗火者已将自己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

这里,就让我们从庚款留学的源头说起,继而全面追寻这一特殊群体不同寻常的求索历程。

目
录

前 言 ■ 1

上卷 庚 款 兴 学

- 一、庚款之耻 ■ 3
- 二、说客明恩溥 ■ 10
- 三、庚款“甄别生” ■ 17
- 四、清华“灵芝” ■ 26
- 五、孑民英伦行 ■ 36
- 六、孟禄使华 ■ 45
- 七、中基会助学 ■ 53
- 八、清华基金沉浮录 ■ 62
- 九、英“退”风波 ■ 72
- 十、列国庚款钩沉 ■ 80

中卷 美 雨 欧 风

- 十一、负笈康奈尔 ■ 91
- 十二、初识美利坚 ■ 102

- 十三、聆教哥伦比亚 ■ 108
十四、磨砚波士顿 ■ 119
十五、留踪芝加哥 ■ 129
十六、修业伦敦 ■ 138
十七、问学“牛桥” ■ 149
十八、钱氏学人浮槎记 ■ 163
十九、归去来兮 ■ 175

下卷 再造中国

- 二十、启蒙之光 ■ 189
二十一、铺路新教育 ■ 199
二十二、科庐初筑 ■ 212
二十三、实业兴邦 ■ 225
二十四、伸张自由民主 ■ 239
二十五、举贤铸栋梁 ■ 252
二十六、走向科学前沿 ■ 264
二十七、寻找大油田 ■ 276
二十八、铸造“两弹一星” ■ 287
二十九、探索生命基因 ■ 301

结束语：历史该怎么说 ■ 317

跋 ■ 323

上 卷

庚款兴学

庚款之耻

公元1900年，即清光绪二十六年，按中国的干支纪年，这个新的百年的开始为“庚子”年。

从这年年初起，慈禧太后和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便企图借助北方的民间义和拳组织去“灭洋”，并相信他们的神符可以刀枪不入、克敌制胜。

一时间，关于义和团运用神术歼灭洋人的军事捷报、奏折如雪片般向朝廷飞来，皇太后褒奖的懿旨又进一步煽动了崇信神术的社会心理，连视维护道统为神圣使命的士大夫们也为之狂热。

御史徐道焜奏称：“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翰林编修萧荣爵上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机不可失。”吏部尚书启秀上奏，坚决请求太后杀尽各国公使，他认为：“使臣不除，必为后患。”并报告朝廷，五台山和尚普济有神兵十万，建议朝廷立即召见普济以“会歼逆夷”。^①

就连作为士林领袖的大学士徐桐也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当他得知义民们把学堂、译署、铁路、电线杆均视为“洋人所藉以祸中国”的害人之物

^① 引自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7页，神州国光社1936年版。



义和团的战士

加以焚毁破坏,凡家藏洋书、洋图者及戴洋眼镜者皆被当作“二毛子”、“汉奸”予以捕杀和严惩的时候,当得知那些读洋书的学生及穿瘦小紧身衣服的人都吓得不敢在街上行走,而洋油、洋车、洋钟、洋眼镜等凡涉及洋字者皆在义民们的攻击下成为社会上的禁忌的时候,兴奋地大喊道:“中国自此强矣!”

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八国联军的疯狂报复。洋兵们的来福枪和加农炮的轰鸣与义和团大师兄念念有词的咒语交织在一起,被大炮炸死的中国妇女身边,婴儿的啼哭声与洋兵们的冲杀声交织在一起。

8月14日,北京被攻陷,慈禧仓惶西逃,整个京津地区遭受了骇人听闻的蹂躏,史称“庚子事变”。

在京津,强盗们公开纵兵抢劫三日,户部和各衙门内外库所存银两,钱法堂所铸新钱,库存禄米,皆被一掠而空。藏珍宝最多的慈禧的仪鸾殿,被抢掠者纵火焚毁。颐和园的历朝宝物被劫运十之八九,累月不尽。

大内皇宫、衙署、王公大臣及民间所存大量文物典籍、古玩字画、奇珍异宝亦被席卷一空。仅法军统帅佛尔德一人,便抢劫珍贵财物四十多箱运往欧洲;观象台的浑天仪,则被德国士兵拆运回国。

洗掠之后,侵略者叫嚣要“惩办元凶”和“索赔军费”,慈禧此时最担心列强将她作为“元凶”赶她下台,后来得知她并没被列入“首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祸”，便又感动得落泪，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慈禧首肯下，谈判代表奕劻和李鸿章应允了列强的“索赔”要求。

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德、俄、英、法、日、美、意等11国公使在《议和大纲》上签字，中国近代史上又一屈辱条约——《辛丑条约》随之订立。其中“赔款”一项规定为：中国政府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为9.822亿两白银。这笔赔款因是针对“庚子事变”而设，故称“庚子赔款”，又简称为“庚款”。



西方11国威逼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为瓜分这笔赔款，列强们争吵得面红耳赤，后来总算按所谓“受损多少”、“出力大小”列出清单，其比例为（取小数点后两位）：俄国占28.97%，德国占20.15%，法国占15.75%，英国占11.24%，日本占7.73%，美国占7.31%，意大利占5.91%，比利时占1.88%，奥地利占0.83%，荷兰占0.17%，西班牙占0.03%，葡萄牙占0.02%，挪威与瑞典各占0.01%。^①

这笔赔款数额如此巨大，连数字本身都带有国耻色彩。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5亿，合人均摊罚白银一两；要分39年偿付，于是中国人面前立即出现了一个无底的债务深渊。这样的严酷事实，使谈判老手李鸿章也不堪重负，签字后神情呆滞地回到寓所，瘫倒在床，接着大病一场，两个月

^① 参见袁希涛《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册，第38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后便在北京去世，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清政府无力清付这笔赔款，只好将其变成分39年摊还的长期外债，由清廷发出五种债券，按照分摊数额交给各国执收，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为担保。

这样算下来，清政府每年仍须筹措支付2200万两该项赔款，约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国年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何况，此前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勒索去的赔款和外债抵押，已费去了全国年收入的五分之一。两者相加，中国每年的总收入，将近一半要作为赔款划拨给外国列强。

清政府没有其他办法应对，只能将赔款再次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以这每年须筹付的2200万两庚款来说，除每年从关税中摊还百万余两外，其余的摊派给各省，其数字大致如下：江苏250万两，四川220万两，广东200万两，浙江、江西各140万两，湖北120万两，安徽100万两，山东、河南、山西各90万两，直隶、福建各80万两，湖南70万两，陕西60万两，新疆40万两，甘肃、广西、云南各30万两，贵州20万两，东北三省免摊派。后来，各省选派庚款留学生的名额分配，也依据其承担庚款的多少来确定，富裕省份名额相对较多，如江苏省最多，每次都在10余名，而新疆和西南地区，往往只能摊到个别名额。

庚款，对凋敝的晚清经济犹如雪上加霜，破坏力极其巨大。譬如，地方政府筹措赔款的来源之一，就是抽取厘金，其开征愈演愈烈，到了疯狂的程度。

抽厘，本是清廷为对付太平军筹饷，于1853年开征的一种临时税，即对所有上市的农贸产品额外抽取“值百抽一”的税款，亦称“厘捐”。太平天国亡后，为应付赔款，不仅没取消，反而变本加厉，编织起一张抽税的巨大网络。各省为抽取厘金，上设总局，总局下设厘局，厘局下设分局，分局下设厘卡，厘卡又下设分卡和巡卡，遍布各府州县的市镇或通商要道。据统计，至光绪末年，全国约有18个省设有厘卡2500余处，用员达2.5万余人。而且，厘卡还可以设标拍卖，以至上下勾结，层层承包，层层加码，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章鱼蛰伏在中国大地上，拼命吸吮老百姓的血汗。

蒋梦麟先生曾在其回忆录中描述过他亲眼所见的抽厘情景：有一条装西瓜的船从关卡附近一座桥下经过，马上被岸上伸下来的一根竹柄挠钩拦住，岸上跳下好几个稽查，用铁棒往西瓜堆里乱戳乱插。西瓜主人慌了手脚，答应他们要缴多少税就交多少。税交过后，这位可怜的农夫才得继续驾船前行。^①

可以想见，国人对庚款是怎样一种心情。也正因为如此，在条约签订后，朝野上下一片沸腾，要求减免、废除庚款之声播于环宇。可列强们却毫不理睬。

但这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却做出一种姿态，声称“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他的这一表态，1902年1月间的美国《纽约时报》作了报道。而此时，恰逢清廷派梁诚出任驻美公使，他看到后欣喜万分，因为这不仅透露了美国索赔的庚款有水分，也表明有向美国争取退还庚款的可能。于是，他一面向美国政府交涉，要求核减退还，一面向朝廷上书禀报，从而拉开了在中美政府间要求退还庚款的序幕。

海约翰为什么主动说“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呢？这里就涉及到美国对华微妙的外交政策。

当初，列强在北京开会决定条约的内容之前，海约翰就给了美国代表团两个有关索取赔款额的指示，一是提报美国损失索取额2500万美元，这个数额，将损失虚报了两倍。其二，与列强协议总索取额不超过1.5亿美元。他的策略是，用削减美国索取额为由，在会议上要求其他列强也削减他们的索取额，并借此向中国要求贸易上的权利。但最终，美国与其他列强削减索取额的协商失败了，美国没能做成“好人”，却从中获取了超过实际损失两倍的赔款额，这也就是海约翰所谓的“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

但是，美国为什么要充当这一“好人”角色呢？这与1899年到1901年间美国发轫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关。

美国外交官兼汉学家柔克义，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倡导者。他早年

^① 《蒋梦麟社会文谈》第97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在法国学中文,就职于美国驻北京和朝鲜的领事馆,后辞职,去西藏和蒙古旅行。1893年,他又回到外交界服务,并对中国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庚子事变后,列强在北京开会讨论赔款,他是美国代表团的特别助理。1905年4月,柔克义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欧洲列强和日本已各自在中国划下他们的“势力范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甚至将其定义为:是对中国某一块领土的一个标记,以表明如中国被分解,英国不愿任何别的国家得有这一块土地。

在此之前,美国因专注于国内事务(南北战争),放松了海外拓展,随着战争结束、全国统一、生产力快速发展,至19世纪最后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首位,这时它希望拥有太平洋西岸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域。

正是抱着这一目的,在柔克义的倡议下,1899年9月6日,海约翰指示美国驻英、俄、德、法、日、意等国大使,分别向各驻在国政府提出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照会。基本内容为: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投资事业,他国不得干涉;各国运往上述“势力范围”内各口岸之货物,均按中国现行关税税率收税,其税款皆归中国政府征收;各国对进入自己“势力范围”的他国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之港口税。

义和团运动开始后,海约翰估计中国不久会被列强分割,因担心失去统一的中国大市场,故将“中国领土的完整”也包括在“门户开放”政策内。1900年7月3日,在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威胁津京之际,海约翰在第二个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照会中又提出“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才能使自己保持与其他列强在对华利益上的“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

美国的立场之所以能够被各国接受,还在于柔克义对这一政策所持的“指导思想”,他指出:要维护在华利益,则中国必须安定和有秩序,这不仅是为了贸易,更是使其无法逃避对条约国家的义务。

正因为如此,海约翰才对中国的庚子赔款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态度,这也为梁诚要求美国退还庚款提供了对话渠道。

梁诚是广东番禺人,生于1859年,他11岁那年作为容闳招收的最后一批(第四批)幼童赴美国留学,先入阿默斯特学院学习希腊文,后入非力普·安多弗学校,是该校垒球队的红打手及投手。1881年被集体召回,后以贡生资格授主事,不久,经考试录为总理衙门章京,办理电信及记录事务。之后在大清会典馆任职,补员外郎。1902年,出任驻美公使。

梁诚赴任后,不失时机地力促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最初,他要求美国暂时接受以银代金为赔款,但被拒(《辛丑条约》规定赔款以金交付),遂又改变策略,要求退还部分赔款。他对海约翰说:“美国人民在《辛丑条约》条款中享有一些公理和权利,可是,外交却无法对这公理和权利给出答案。”他建议:“也许对赔款额加以调整,可以使总统较清楚地看出我国要求的公理。”

梁诚在公使任期内,以安多弗学校的忠实校友著称,他还被选为阿默斯特学院1885届荣誉毕业生,并获得耶鲁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授给的荣誉学位。在华盛顿,海约翰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都曾友善地接待他,他曾告诉安多弗学校的校友说:“当时,我跟罗斯福总统说,我就是那个人,那个在1881年用三垒打击败菲力普·埃克塞特学校(安多弗的兄弟校),而使安多弗获胜的人。从那时起,总统和我的关系增强和接近了十倍。”

1905年4月,在柔克义离美赴华就任公使职之前,梁诚与柔克义作了一次会谈,商讨减额步骤。在商讨时,柔克义提到,美国总统希望知道如果美国退还赔款,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笔钱?

梁诚由此意识到,美国就是退还赔款,也会在使用上加以干涉。但是,如果不接受,退款计划就可能落空。他遂致函外务部,建议在接见柔克义时事先准备好有关这问题的答案,他同时提出自己的想法:用这笔款子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他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和民间都会支持这个计划。

柔克义到中国后不久,于7月12日上书罗斯福提议退款。他说,中国政府向他表示,美国若退还赔款,中国将把这笔钱花在教育上。

但是,关心和支持此事的国务卿海约翰忽然于该年7月1日逝世,其

继任者伊莱休·鲁特却提出了另一方案：要等到美国收回“足够的”赔款后，再开始退还超额部分。这样一来，此事也就搁浅了。

但是这件事并没到此结束，反而引起了在华的美国商人们的关注，他们迫切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通过退还部分庚款来改善美中关系，重新激活因美国国内的排华政策而导致的美中贸易大萧条。而他们提出的退款理由，同样是将所退赔款用于吸引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让新一代的中国人学习和接受西方的文化与传统，从而使中国不会再发生义和团这样的事件。

这些人的代表者，便是西方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身兼牧师与商人双重身份的明恩溥，他为促成美中两国政府之间“退庚款以兴学”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二、

说客明恩溥

明恩溥，原名阿瑟·史密斯，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天津任传教士，时年27岁，明恩溥是他来华后起的中文名字。

明恩溥是著名的中国通，生平颇具传奇色彩，特别是当中国向美国要求“减免或退还”庚款的交涉被搁浅之后，他却万里迢迢跑回国，当面向总统游说，促使美国政府作出“退款助学”这一重要决策。因此，说到庚款留

学,就不能不说到此公。

明恩溥来中国后,在天津没过多久,便被派往山东恩县(其地今分属平原、夏津、武城三县)传教,没想到,他在恩县偏僻的乡村庞家庄一住就是25年。那么,是什么吸引他如此长久地蜗居在中国的农村呢?除忠于职守外,他确实还有自己特殊的喜好。

明恩溥与一般的外国传教士不一样,非常喜欢到民间采风。每天,他都身穿长袍、头戴教帽走村串户,随身带着他的“百宝箱”,里面装着《圣经》、药品、听诊器、识字课本、水果糖和一些准备布施的铜钱。

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每到一处总是关心那里的人们并与他们倾心交谈,还看病施药,逗弄小孩子玩耍,有时也进行布施,博得乡民们的好感后,再去教他们识字,然后向他们布道。久而久之,他就熟悉了这儿的乡土民情,也弄明白了许多具有东方人思辨色彩的、很具形象性的乡间谚语与格言,他认为这是一种极有特色的中国文化,于是进行收集整理,先是发表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后来结集出版了《中国的格言与谚语》。

由此,他对中国最基本的人群——乡村的农民进行了深入观察与比较,发现了许多他认为是“中国人的特性”的东西。譬如,中国人知足常乐,却又因循守旧;中国人孝顺、仁爱,却往往又缺乏同情心;中国人温顺、客气,但要面子却到了固执的程度;中国人好名利,却又怕得罪人;中国人有责任心、守法,但却又爱相互猜疑,缺少信用,等等。有了这样的生活积累,在他来中国的20年后,撰写了《中国人的特性》一书。该书问世后产生很大影响,1890年首版后,1892年和1894年又分别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等地再版,以后还多次重印,并被译成日、德、法等多种文字。

对这本书,鲁迅先生也很推崇,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许多批评,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此书的影响,直到临终前不久,他还惦记此书,希望后人能尽早翻译出来;后来,潘光旦、张梦阳等学者分别节译过此书。

此后,明恩溥又撰写了《中国的农村生活》一书。他的这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的中国观,明恩溥也成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通。